



SHIJIFENG CONGSHU

世纪风丛书 | 包亚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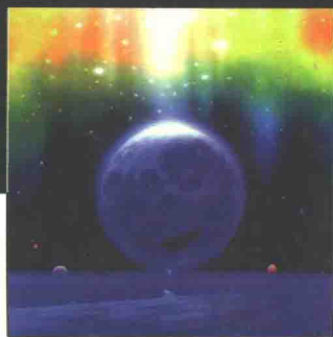
欲望

的

辩证法

辩证法

欲望



生于九十年代

学人批评文丛

倪文尖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SHUIFENG CONGSHU

世纪风丛书

包亚明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欲望 的 辩证法

倪文尖 著

丛书策划 唐继无
责任编辑 唐继无
装帧设计 王月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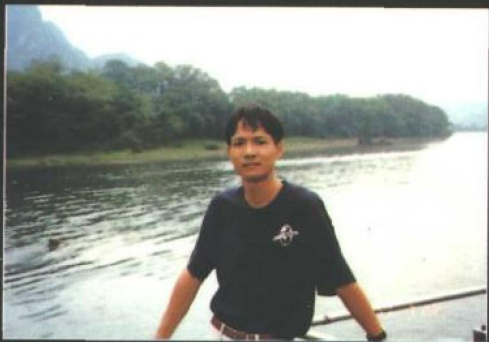
欲望的辩证法

倪文尖 著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开本	850×1168 1/32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张	6.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千字	170 插页 2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
		印数	1—5100

ISBN 7-80613-692-4 / G·577

定价: 12.00 元



倪文尖

倪文尖，1967 年生于江苏南通，1985 年抵沪求学，1996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1988 年起发表有关论文，本书是作者第一本批评论集。

目 录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1
----------------	---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断想与玄想	13
-------------	----

“海派”话语析论	15
----------------	----

碎片:现代 中国 文化	33
-------------------	----

细读与重读	45
-------------	----

欲望的辩证法

——邱华栋的写作姿态	47
------------------	----

解析,有关一个“孙甘露命题”

——《岛屿》的读法	60
-----------------	----

不和谐:形式—意义—情绪

——破译“刘索拉语式”	67
-------------------	----

《华威先生》:当代视界及其他	75
----------------------	----

KA146/05

不要忘了林语堂

——读《京华烟云》 84

钱字与张字 93

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

——从小说到电视剧 95

“18 世纪”的《围城》 119

作家钱锺书通论 127

不能失去张爱玲 159

张爱玲的“背后” 165

后记 194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

每一代都自以为是最不幸的一代，每一代又都自觉是最幸运的一代。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作为自然时间的绵延，无所谓幸与不幸；然而，“历史”又不是历史，“历史”是话语权力的角斗场，“历史”是历史上的成功者的历史。所以，对于一代人而言，所谓“历史的幸运”在于，创造历史的同时也进入了“历史”；而最不幸的

则是,作为同样见证历史、参与历史的一代却不被“历史”记述,甚至连能否作为独立自足的一代而存在,“历史”也存有疑问。

而我们——出生于 60 年代的一代人,面临的或许正是如此情形:在 80 年代,我们二十出头,但所谓“80 年代青年”确乎指的不是我们;到了 90 年代,我们三十挂零,而我们好像又没资格称得上是“90 年代青年”。我们的青春期跨越了 20 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可我们却未能“二者必居其一”地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角;在人生中应该最富激情与创造的黄金时代,我们竟无法引领风骚、开创局面,以自己的作为与气象来征指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凭什么获得我们的代际特征?我们怎能算是一代人,又算是怎样的一代人?

我们毕竟拥有一个共同的过去,而有关童年的记忆无疑是我们共同经验的最初来源。

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时空里,我们从小便知道凡事都要有“政治意义”。比如语文作业造句,有谁拿“用”字造出了个“用人”什么的,会被老师大骂有剥削阶级思想;而谁以“非常”造句,能造出“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健康,万寿无疆”,则会被老师标为范句,好好地受通表扬。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打仗、捉坏蛋;我们还老爱画“军事地图”,将小朋友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标得一清二楚;我们看的小人书上,没有一个敌人的脸上不被打×,直至最终敌人都给我们划破了而看不见头,好像很有快感;另外就是爱到处涂写“打倒×××”,仿佛我们从小就知道生命中有一种叫爱叫恨的激情可以令人迷醉。然而我们究竟还小,由于童心的敞开性,又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中心的政治事件能将我们整个地吸引住。我们可能会对一排标语中“打倒”后面的人名为什么非得倒着写更感兴趣;可能会把某次政治

运动中的批判发言当作一次满足小小年纪却不小的虚荣心的良机。所以,政治侵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极大程度地构成了我们的童年生活,然而我们却还能够本能地反过来利用它去丰富、滋润我们的童年生活,至少,在“泛政治”的背景下,我们有关的记忆很多却是“非政治”的。

不过,从小的“政治生活”确乎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原始印记。我们小时候的英雄都是真英雄,因为宣传机器把英雄们怎样胸怀神圣理想,戒骄戒躁,最终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过程描绘得详细清楚,这样,英雄是人格化的,使我们都以为只要自己愿意努力就也能成为英雄,所以,英雄的体验和成就感之于我们是极大的诱惑、永恒的向往,我们无意识中将英雄建功立业为理想的豪情内化到了我们的骨血里,成为一种最能安身立命的人生方式;而长辈辉煌的传奇故事听得太多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教育还时刻提醒你,你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你不能是一个平庸的人,你生活在一个英雄的时代,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你的未来将是一个更辉煌的英雄时代,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生来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我们无法想象,未来的人生怎么能为了一己的私利忙忙碌碌或者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一般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与理想主义总有牵扯不尽的关系,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出生于 60 年代、成长在 70 年代,无论如何,那是一个或真或伪、或善或恶的理想在激昂的时代;多年以后,形形色色的理想的内容已经化为飘逝的烟云,甚至成为历史的笑柄,但理想主义作为一种“形式”却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童年积淀,并构成了沟通我们一代人的心照不宣的秘密。当然,比起终究少经人事的童年,80 年代的心理与精神成长期对我们的影响更为深远,特别是,在我们的大学时代,有我们这一代的更清醒、

更清晰的共同经验。

我不能不提到 80 年代的“文化热”。在那个知识分子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头，现代西方人文哲学思潮不断地最大限度地化为各方面的新信息、新观念，怀疑主义无可置疑地成为反思传统、文化启蒙的旗帜和资源；我们的上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体，他们以其清醒的批判意识努力在文化废墟上促成一个解放思想、振兴中华的新高潮；而我们正是他们的学生，天然地、宿命般地成为这股热潮最富激情和最虔诚的拥戴者，我们早早地在讲座教室放本笔记抢占位置，早早地在那儿期盼某位青年学者、演说好手；我们恨不得年长一些、阅历丰富一些，也能像他们一样地思考，一样地表达，一样地成功。因此，在那过程中，我们用浪漫理想的老匣子又囫囵吞枣地装进了另一种恨和爱的激情，是在“文化热”中我们把从小而来的“英雄梦”有所附丽地具象化了，它化成一种当时很觉实在的“文化英雄”的形象，使自己心甘情愿地为人类“认识你自己”的知识大厦，终其一辈子地认认真真做块砖，从而因为人类知识的传承而获得永恒的历史中的存在；并且我们很乐意服膺“文化热”的泛文化、泛精神倾向，从而把自己的行为相对于思想的种种滞后性都归罪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在类似再造新我的青春期焦虑和渴望中，更绝望于自己以及所属一代的不可救药，于是极易认同鲁迅先生的“中间物”意识，在民族生命伦理学的高度上由衷地企盼，在国家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实现之日，我们的后辈们都能人格健全、活泼向上地穿行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都太认定“文化解决”的有效性了，似乎自我问题、中国问题等等任何困境都能在形而上、文化学里终极性地一揽子解决，所以，“腾飞”、“超越”等重词、大词都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为了最终找到“腾飞”、“超越”的不二法门，我们认为放弃别的什么欲望都是值

得的、必要的，因为我们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自觉的欲望就是“腾飞”和“超越”，至于“现代化”和“日常生活”的关联是想也想不到的。

也许每一代人都自觉历史嘲弄了自己，但我想我们这一代的如许感慨倒并非简单的重复，因为在 80 年代后期以后，我们又共同遭逢了一个商品、市场、经济的大潮，我们有我们共同的焦虑，我们也有我们共同的收获。

我们在“文化热”中已经把自己塑造成那样，我们为此充满了幸福感，我们正准备按部就班地为民族、也为自己实现理想，可我们一下子踩空了，我们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也许这样一种“悬空感”是我们这一代最刻骨铭心的体验之一，因为或许早生十年八年，我们已经在文化批判的合唱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或者索性晚生三年五年，我们不知“文化热”为何物，我们没有在 80 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我们也就不曾根植那一套文化价值观，也就不再吃“精神贵族”的那一套。可是，变化偏偏一来就来，而且来势极猛，对“露峥嵘”亦露“狰狞”的市场经济浪潮，我们是不由自主地耳闻目睹的，是从增加了的助学金以及不断上扬的书价中感受到的。一开始我们用“文化热”中学来的眼光看，的确几乎“看不懂”；然而年少气盛，不屈的理解欲不允许我们“看不懂”，更不允许我们不看；渐渐地，我们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去张望，用开放的心灵来迎受，我们在良莠莫辨中感到了悲观，也发现了机缘。或者更坦白地说，由于年轻，一切还不足够坚定，我们特容易受诱惑，一副网球拍、一双 NIKE 鞋就一下子激活了我们的世俗欲望。我想，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史上，这一下子被激活的经验是全新的，它必然也同时伴随着一种尴尬的体验，好在当我们的欲望活起来的时候，从“文化热”中获得的自我又告诉我们，第一不能撒谎，第二要顺其自然。也许我们

这一代对于物质并不算贪婪,但我们已经不能容忍在基本生活面上采取阿 Q 的方式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难以想象在一派窘迫中可以获得持久的快乐和全部的自我。或许事情就是这么怪,我们这些平常不过的俗念俗想却帮助了我们在巨大的转型中渡过了难关,确立了一颗平常心,并进而促发了我们对之冷静、理智的批判热情。

在这个意义上,像我们不能忘了“文化热”给我们初步造型、教我们选择自我一样,我们一代人也要感谢在我们尚未完全定型、在我们还在成长的时候,我们正面遭遇了一个“世俗化运动”的经验。也许是它才把我们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遮蔽中最终解放出来,以一种赤裸裸的真实还我们一个更真实的自我,因为无论如何,商品和市场毕竟让我们明白:现代化也不是图纸上设计或者思想领域革命就可以实现的;随浪漫的形象而来的冲动或激进也许离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追求来得更远;也许,人生及人类存在的目的是在于“活得更好”,而所谓“活得更好”的过程是和琐屑、凡俗、平庸甚至无聊紧紧扭合在一起的。

很显然,我们自小以来,特别是在青春期阶段,受到了几乎刚好相反的思潮的深刻影响和冲击,我们遭逢和体验了不同的时代,而我们这一代最大的共同经验就是“断裂”的经验。汤因比曾说,过渡时代的人痛苦是,他们“在”而“不属于”两个时代,而按我们的身心感受,更大的痛苦却是,由于你有“属于”两个时代的思想和逻辑,所以你不清楚自己的立场究竟是在哪个时代,由是之故,你“不在”任何一个时代;而且我们又有过强的自我分析癖好,竟将这种“不在性”厘析得无处不在,世界和自己都因此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令人怀疑起来。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断裂”感,一种不足与外人道的经验,而我们这一代又是依靠它手连手、心连心,让我们自己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代人的存

在。

谈我们的知识传统,要从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谈起,如果说高考的恢复瞬间改变了我们上一代人的命运,那么,被恢复了的高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则对我们的知识化、成人化产生了更大、更持久的决定性影响,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连续的、系统的、正规的基础教育体系得以重建、充实、完备起来。应该说,这使得我们受到了比较良好的教育,当然这良好的教育同时意味着是一种正统的教育。所以,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基本的是非观、朴素的马克思主义潜移默化地构成了我们知识大厦的根深蒂固的基础。时至今日,也许我们自己已对此浑然不觉,因为我们一代人印象更深的是那种知识学的突变带来的震惊效果,毫无疑问,它也发生在我们的大学时代。

而这又不能不提到 80 年代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时期发生的“文化热”。我们的读大学与其说是一个已有知识结构的顺延习得过程,毋宁说是一种对我们朦胧模糊的文化知识结构、价值体系雏型的全方位“施暴”工程。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特别是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的精神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在我们尚未有足够的真材实料、真情实感为依托的背景下,占据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疯似地一知半解地读萨特、读佛洛伊德,我们的兴趣也好像不在存在主义或精神分析的知识学,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来龙去脉、区别联系,我们更无暇顾及、无力思索;我们从“美学热”追到“方法论热”,确乎是为了更新思维结构与方式;我们以为一有思想就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谁也不敢、谁也不愿落后一步;所以,我们成为流行思想的“发烧友”,我们把青春激情都倾注在铺天盖地的新知讲座上,也便把学习的时间放在了课余,放在了那些激动人心的晚上。假如说现在有什

么后悔,我看第一条就是,那时我们太懒得听头发花白、被认为是“没有思想”的教授讲古代,讲经典,讲基础了;而课外那些我们原来自以为是自由选择去读的书,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上一代人为我们圈定的。更坦白地说,我们大学阶段的所谓“学习”,实在就是向我们的上一代人学习,尽量地向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方式靠拢,构成了我们学习的目标和动力,而他们的著作、文章哪怕假说都成为我们学习的内容,一句话,自觉地把我们自己同化为他们的过程便是我们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要分析我们的知识传统,就无法不对我们在“文化热”中的学习有个清醒的估计,我以为“文化热”留给我们更切实的财富是观念、姿态与眼光,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人文气质和精神,至于更充分的学识,特别是多少有些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体风格的知识结构、学术训练,倒是在“文化热”过去之后慢慢培养获得的。

这里我想格外提及结构主义。作为存在主义之后的又一席卷全球的人文学术思潮,它突出地唤醒了我们对结构、对形式、对文本的重视,这使得我们有可能与过分的“人学”喧嚣拉开必要的距离,获得了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人类学的更多的观照问题、观察世界的视角;它还帮助我们建立了一种纯粹知识学的兴趣,因为结构主义的方法可以更好地打开文本,使文本的形式分析成为一项兴味盎然的工作;它还培养了我们形成我们自身学术风格的自信,因为在80年代中后期,接受结构主义包括语言学、符号学的训练,使我们同上一代学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在这方面我们有自己学得快、用得活的长处。更值得强调的是,结构主义自然地带来了解构主义,接触结构主义使我们接触到了福柯,而福柯又连带了哈贝马斯、利奥塔、杰姆逊、罗蒂等一批“后学”人物,使我们在一个全球的语境里开始接触到“后现

代主义”思潮，而由此，我们这一代的知识传统在“文化热”中有所收获的基础上，又更丰富、复杂起来。要说清楚它，便成为在此几乎不可能的事。

同样，阐明我们一代人的文化立场也是本文不能胜任的工作，因为在我看来，我们有没有一个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文化立场，甚至我个人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以贯之的、能够一言以蔽之的文化立场，都不妨持一种怀疑乃或否定的态度。

而究其实，在此还牵涉到一个远为基本的追问，这就是我在有关我们这一代的思考时首先碰上的犹豫不决的问题：我们，出生于60年代的这一代人，到底能否构成独立自足的一代人？能，是在什么意义上？而不能，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上？

在我们上一代人的视野里，在一本轰动一时、影响不小的书《第四代人》中，我们曾被派定、命名为“第四代人”，并被寄予了美好的想象与殷切的期望。然而，好些年过去了，作为“选择的一代”我们选择了，作为“行动的一代”我们也几乎行动了，但“选择”与“行动”的结果却没把我们领到“第四代人”所意指的辉煌时空。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所谓“第四代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数字排序而来的称谓，它是一种进化论思想决定下的文化命名，是一代人“文化想象”的产物。因为在一个“1840”以来的时代里，被现代化的中国人太需要这样的“文化想象”来刺激、来补偿了，在这个意义上，“第四代人”的所指极其丰富，“第四代人”是独立、自由、公正、幸福的人，而“第四代人”在这块土地上的真正出现，则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所以，“第四代人”是个美好的想象性的称谓，也更是个典型的“空洞的能指”。——顺便说一句，“第三代人”将近在咫尺的我们指称为文化学意义上的“第四代人”，既表露了他们的焦虑，

也更显示了一种 80 年代式的浅薄的乐观。

因而在类似有唐一代被归纳为“盛唐之音”的“大历史”观照下,或许龚自珍、魏源与我们只是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都是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中人,过渡性的一代又一代。而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为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人、下一代人的同或不同而无限焦灼,“大历史”里绝无我们,“小历史”里也未必承认有一个我们——60 年代出生的人们。我们这一代只有在当下全身心的感受中感觉到自己的痛,叫不出的痛,由这隐痛而沟通我们一代人。这是历史弄人之处,这也就是历史的大手笔!这就是说,我们这些 60 年代出生的人,如果说是一代人,只能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在文化学的意义上,我们并不足以构成自足的一代人;我们不配成为“第四代人”,而我们也没成为“第三代人”,我们只是“不三不四”的一代人!我们虽然拥有一些共同的经验,但我们最大的共同经验却是“断裂”的经验,因为以商品、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所谓“百年难有之转型”,在我们的成熟期中将我们拦腰斩断;我们虽然已开始形成一些自己的知识传统,但我们还无力清理、说清这一传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三不四”的,关键要看“三”与“四”之间的零头;有的靠“三”近些,有的靠“四”近些;有时离“三”远些,有时离“四”远些。

即便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我们这一代的“无名状态”也显得十分地突出。我们的上几代人,他们往往与社会结合得非常紧密,紧密到个人身份由社会共同赋予、由大家共同分担的程度,比如“老三届”、“知青”、“77、78 级”,有千百万人把它当成自己的标记,并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话语系统、观念谱系、文化权势;而我们,通常被认为是“经历平淡”,不大可能从一代人的共同经历或者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出命名的依据,更根本的

是，我们从精神本质上又拒绝被统一到一个称号之下；在内部的个体之间，我们也没有像上几代人那样，你我他之间有那么多共同或共通之处。而且，如果说在我们上一代人那里，“自己”是明确的，一代人是在与它所否定的东西的对立中明确而坚定起来，那么我们不同，我们发现自己的兴奋远不及痛楚来得更猛，因为我们一代人的“自己”在开始被意识到的时候就难以确定，它内含更为深重。

所以，即便与出生于 70 年代的人相比，我们一代人对自己都没有那么自信。由于他们在青春期几乎是以“白板”来整体性地无所畏惧、毫不迟疑地面对“经济潮”的冲击，因而 70 年代出生者的勇气和果敢往往为我们所欣赏；轮到我们自己决策或行动，我们却免不了首鼠两端、看东望西。也许我们的同情心过剩，也许我们的理解力过于发达，似乎所有的事物在我们眼里总是暴露出许多面，并且每一面都有其合情合理的逻辑，它们犬牙交错地纠集在一起，使我们兼顾、平衡起来太难，长此以往，我们几乎要对自己的决断力丧失信心。

就此而言，要让我们端出一代人的文化立场也还是困难的，这里，我倒是想到了一个词：散乱。它既是一代人宏观的鸟瞰式的描述，我们散乱得就像“胜利大逃亡”的队伍，队伍在有与没有之间；它也是每个人微观的兜底翻的搜寻，“你我他”散乱的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有思想，但思想太多，所以散乱；我们会选择，但选择过勤，所以散乱；我们能行动，但行动老变，所以散乱；我们一代人中有的人思想，有的人选择，有的人行动，所以散乱。我们每个人都散乱，所以我们一代人很散乱。难道我们这一代就有一个“散乱”的文化立场？

然而，从“立场”一词的本义来看，“散乱的文化立场”并不能通顺成立；什么是“立场”？立场是我们站在大地上的那双脚的